

受降三十年有感

何應欽

今年的八月十五日，是日本無條件投降三十週年紀念日；日本富士電視爲了要作一個「降伏三十年」的特別節目，特派員專程來台，與我商量，要我在此節日發表一點感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同盟國家的政治領袖，羅斯福、邱吉爾，甚至一直與我們並不友好的史達林，都已相繼去世；而到今年還碩果僅存的總統蔣公，也於四月間不幸崩殞！

至於當年直接指揮第一線作戰的盟軍統帥，如太平洋方面的麥克阿瑟將軍，西歐方面的艾森豪將軍，這些伙伴們，也都已先後奉召歸主，今天只賸下了我一個老兵（Old soldier）臨到這個紀念節日，焉又能不感慨系之！

八年抗戰，在日本方面來說，真是打得大錯特錯。記得在昭和五、六年間——一九三〇年前後，日本有一本暢銷書，書名爲「一粒之麥」，內容的主題是反對侵略中國的東北，作者認爲：日本若實施機械化的立體農業，再加上兩倍的人口都不成問題；因爲日本的向外侵略，唯一的理由，便是藉口於人口膨脹。當時這本書是否也提到工業改進，我不太記得。以五十年後的今日來看，日本只賸下了四個島嶼——本州、九州、四國、北海道；比起開戰的當年，何止小了一半，但還能變成經濟大國。假若，四十年前就向這條路上走去，再加當年的軍力，必將成爲舉足輕重的世界大國。當時的日本，却犯了兩大錯誤；一是政治性的，一是戰略性的。

一八九五年的第一次中日戰爭，和十年後的日俄戰爭，日本都獲得了意外的勝利。在那以後，不管日本是走軍國主義路線，抑或走民主憲政路線，其第一個假想敵，當然是蘇聯，而最後却打的是中國，以致被消耗了所有軍力，這種違反基本政策的作法，首先註定了日本政治性的錯誤。不僅此，在歐戰的前夕——一九三九年四月，松岡洋右和史達林在莫斯科車站的擁抱，當然是想佔一個不打兩面作戰的便宜，但却先破壞了日、德、義軸心的同盟。國無信不立，姑不論軸心結合是否明智，然而背信，總有背於東方文化傳統的道德精神。政治性的錯誤，才導致了今日世界性的混亂。

剛逝世不久的日本前首相佐藤榮作先生，在來台參加了總統蔣公的奉厝典禮後，曾發表一篇「哀吾蔣公」的文章，一再表示今日世界的混亂局勢，日本實應負責，尤其是對中國；這真是佐藤先生由衷之言。

國父孫先生曾經有句名言：中國強盛了數千年，也沒有侵略朝鮮，而日本僅出頭了半個世紀，便併吞了韓國，這是日本政治家的短視。其後，日本又鯨吞中國的東北，更有人說：那是吞了一顆定時炸彈，真是不幸而言中！

中華民族，經過幾千年的折磨與洗鍊，早已成爲一個金剛不壞的結晶體，而且富有極大彈性的堅韌力。當其受到外力的侵略時，固然也會蒙受一時的損害；但終局不是被它所同化，便是爲它所克服。追究其原因，實

在是因爲中國有一個傳統的文化精髓，那就是我們所熟知的中庸之道。這就是歷代中國政治思想的骨幹，也是中國政略方針的基本原則。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本來是中國固有的八德。但在我個人却有一個變格的讀法：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對國家之忠，父母之孝，人類之仁，這些都出於「愛」，是絕對性的，是無條件的；可是存在於世界人際的信、義與和，則都必須以「平」爲基礎，是相對性的，是有條件的。中國大儒顧亭林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匹夫是小市民，是個人，匹夫都能以天下之事爲己任，這是出於愛。而這個小市民，這個個人，若打他一耳光，他便要和你拚命，他會說：士可殺而不可辱，這是出之於不平。這種洗鍊出來的民族性格，在中國人固習以爲常，但常不爲其他國家的人所能深切體會與了解。

你能說日本人不懂得中國的文化麼？日本的文化誰都知道是淵源於中國，至少在明治維新以前是如此。可惜的是日本學習了中國文化之後，又摻雜了武士道精神，而却又走入了魔道，剛愎、固執、自大，使得日本的政治思想，捨去了王道而走入霸道，這是日本當年政略錯誤的根源。

日本侵略他國的藉口，不外是人口膨脹和資源缺乏兩點，現在的日本，是外無寸土一殖民地，內無寸鐵一資源，却成了經濟大國。當年若不使用武力，而發展技術，和中國站在平等互惠的立場來合作，其成就又何止如此！

西洋人說：上帝如要人死亡，先使他瘋狂。德義是因爲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以才走入政策的邪道，日本並沒有一位真正的獨裁者，誰該是禍首呢？當然是軍閥集團，可是一部份日本人的「偏激性」，却感染而成爲日本人的病態，戰前盲從軍力擴張，戰時狂呼着武運長久，戰後却反對共同防衛的原子潛艇寄岸，你能說日本民族性沒有一點「偏激」麼？而大眾傳播，又歪曲了正義，更導致日本民族走入了偏激之路。

再縮小一點範圍來說：日本當年除犯了政略性的錯誤外，對中國戰爭

，還犯了戰略性的錯誤。

記得抗戰的前夕，我正任軍政部長；

總統蔣公當時的蔣委員長，雖已下了最後的決心，但仍諮詢我們僚屬的意見，問我對於戰爭準備的程度如何？我當時報告：

第一、徵兵制度已始於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雖然還不能徹底實施兵役法令，僅能說已有一個好的開始。

第二、交通通信的整備，因地區遼闊，只能從點線着手，還不能普及到面。但浙贛路業經開通，湘桂路已近完成，這都是對內陸交通的戰略幹線。

第三、武器彈藥的製造，僅能達到輕武器的持續補給，重武器和海空軍還不能不仰仗於國外的來源。

這樣的說法，對作戰的各種準備，未免太不夠充份，理論是不應該打的。但蔣公和我商討的結果，爲了民族的生存，國家的尊嚴，還是決心打。因爲在戰略上，我們的優勢，第一、打的是我們國土廣闊；第二、打的是我們人力充沛；第三、尤其是重要的打的是我們全民萬衆一心。當時我還提到過麥金德的心臟大陸論，在核子武器和洲際飛彈還未發明之前，這個心臟大陸論，仍然是兵學上的聖典。

其實，在「七七」、「八一三」這個時期來抗戰，就情勢來說，對我們是極其不利的。不僅強敵當前，而我們自己的內部，也有四種害蟲：中共、舊軍閥、官僚、失意政客。舊軍閥、官僚本是時代的渣滓，一向是在夾縫中圖存；失意政客，無非是想利用一致抗日的口號來參加政府；這三種人都不太關緊要，儘管舊軍閥還有一部份武力，但也很容易化悲憤爲力量，並非不可運用；最爲害的當然要算是中共。

自從江西剿匪節節勝利後，中共二萬五千里長「奔」的流竄到陝北；假設當時再加一點力量把他們根除的話，不僅我們一部中國的本國史，甚至整個世界的現代史，也許都要另換新頁。可惜是功虧一簣，殘留了一點細菌，致令星火燎原，這不能不說是我們中華民族之一大悲慘命運！

「安內攘外」、「敦睦邦交」，這原是七七事變前兩句家喻戶曉的口號。為甚麼 蔣公當時要那樣的容忍呢？無非是想以時間來換取空間，以作萬全的準備，而後再來對外作戰。可惜的是時不我待，日本既首先發動攻勢，迫使我們不得不以哀兵來應戰。

從日本方面來說：這不是一個大好的時機嗎？但丟開前面所說戰略上的錯誤不談，顯然這又犯了戰略上的錯誤，因為日本儘管把握了一時性的「天時」，而却失去了「地利」及「人和」，地利是中國的心臟大陸，人和是我們的哀兵必勝。

日本所犯的戰略錯誤還不止此，以陸軍投之於心臟大陸的中國，却又以五、五、三比例的海軍投之於太平洋上，不僅兩面受敵，而且是全軍覆沒。

珍珠港固然獲得一時性的便宜，但心臟大陸和汪洋大海又有什麼分別呢？不過是麥金德主義換了馬漢主義而已。

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戰略錯誤，也要分兩點：第一、是「陸軍萬能」。日本是島國，也曾以中日、日俄兩次海戰而起家。但到了侵略我東北以及在中國大陸作戰，海軍成了「鑲邊」部隊。數十年前的光榮，早已被陸軍佔盡。所以在初期佔的島嶼，因為美、英、法、荷的海軍完全癱瘓，又增長了陸軍的氣焰，海軍變成了掩護和運輸的工具。

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極大的錯誤，是忽視了空權。日本飛行隊，雖然建立的時間很短，但也有過輝煌的戰績，珍珠港事件以及威爾斯親王號與敵敵號的炸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都是眾所週知。可惜組織上是屬陸海軍分別的附屬品，永遠受不到獨立性的重視；所以只有戰術性的作戰，而少有戰略性的任務。

「虎、虎、虎」在珍珠港雖然成功，却很少人知道中途島的慘敗，那是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的空戰，日本就損失了四艘航空母艦，六七百架飛機。這是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從此日本在太平洋上便失去了制空權，

因此也就一蹶不振。

綜觀那一次戰爭，日本可以說是扮演了一次孫悟空大鬧天宮的鬧劇，其結果，對中國、對亞洲、甚至對世界人類，遺害了三十年，今後還不知伊於胡底！而日本自身却逍遙法外。

那末日本又怎會有今日的復興與繁榮呢？無可諱言的，這是 蔣公的澤惠所及。蔣公對日本的恩德有四點：一、中國不派佔領軍；二、是在十個月的短短期間，遣送日本在華僑俘二百三十餘萬人；三、是不索賠償；四、維持天皇制度。第一點使日本免於被蘇聯分割，比今日的德、韓兩國幸福得多；第二點據日本本國的統計，當時留華日本人的潛力「國力」佔日本全國八分之一，青年人力是六分之一，這是日本復興的最大本錢；第三點不索賠償，假定以五百億美元為準，這在日本戰敗後的當時，實在是一個天文數字；最後，蔣公主張維持天皇制，則是安定了日本的社會與國家，使日本免於混亂。

蔣公為什麼那樣對日本寬大呢？蔣公深知冤怨相報，是人類相互鬥爭的根由，使如何能達成世界大同，天下為公的境地，這就是 蔣公繼承中華民族文化傳統思想與基督精神的弘揚與發揮。

受降三十年，日本富士電視邀我出席電視節目，我想藉此或許可以使日本青年也能了解並記取這一段戰爭歷史對我們和日本的痛苦經驗與教訓；同時，我這個老兵，今日白頭話舊，內心實在充滿了無限的感慨。

放眼世界，真不免老淚縱橫；但願我這一席之話，能對今日日本青年，和日本的未來，多少有一點貢獻！

